

編者按

與6月號本欄探討1964年文革前夕中國的一組文章緊密相連，本期三篇文章是追溯1958-63年的中國社會、經濟和政治。

按照一般印象，大躍進和困難時期的中國社會相當穩定。但這符合歷史真實嗎？李若建依據1990年以來出版的各縣市地方志所披露的大量材料，再現當時農村基層境況：搶糧事件和小規模騷亂不斷發生、刑事案件大量增加；在當時，這些由經濟原因引發的騷亂，大都以反革命罪或刑事罪及時並嚴厲地加以處治，政府也相應推行了「三自一包」、處理不得人心幹部等政策，調整得宜，這樣才有效地穩定住大局。如果說李若建重現了那一時期基層社會的嚴峻困難局勢，那麼，高華則是側重梳理當時中共高層的分歧。面對農村大批非正常人口死亡和騷亂，毛澤東為了保衛三面紅旗，將其視為階級鬥爭的表現，形成了四清運動的基本思路和相關措施；而劉少奇、周恩來、鄧小平、陳雲等則無論在認識局勢或推行具體政策方面都相當務實。1962年下半年，經濟開始復蘇，毛澤東舊話重提，並迫使中央核心層接受其意見。1963年春夏之後，四清運動便在全國全面鋪開。

趙勝忠的文章很特別，是分析那套「畝產數十萬斤」的浮誇統計體制的成因及嚴重後果：由於大躍進既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嘗試，又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政治試驗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。為了證明大躍進的政治正確性，全國統計部門不得不服從各級黨政機關的意志，炮製一個個高產衛星，形成一套弄虛作假、欺上瞞下的統計體制；困難時期所說的「三分天災、七分人禍」正與這一體制密不可分。最後，需要指出，本刊歡迎像作者這樣正修讀研究院的學術新人。